

1946年前后历史转折点上的东北文学

——以《东北文学》的创作和争鸣为中心

张丛皞

【摘要】1945年8月东北光复后,创刊于长春的大型文学期刊《东北文学》展现了伪满作家告别旧我,创造新我,积极建设东北文坛的热情与愿望,以及在历史解放后自我救赎的种种努力。他们总结着“丰富的过往”和“有限的过去”,沿袭着“东北意识”和“创作惯性”,流露出“自我纯洁化倾向”与“个人危机感”。这本杂志上的创作及与之相关的争鸣,真实地体现了缺少主导潮流的惶乱自由的东北历史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粗糙面上,伪满作家面对幽冥莫辨的未来的困惑迷茫和他们试图维系在东北文坛的主体地位的顽强坚持和自处之道。他们与彼时现实的多元和不适关系中也隐含着认同危机与文化割裂的痛楚,以及旧的文化与文学时代即将终结的历史讯息。

【关键词】《东北文学》;伪满作家;文化转型

按照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和惯常的认识,抗日战争胜利和东北光复后,东北文学的演变历程由“伪满文学”时代跨入了“解放区文学”时代。从大的历史结构和线索上讲,这种以政治背景对文学时代的划分无疑是有效的,文学主题与文化体制的宏观性转换也印证了这种认知。我们今天讨论东北文学的各类问题,基本上泾渭分明的在“伪满”\“解放区”历史时代的楚河汉界两侧展开,即,在伪满洲国的历史维度中探讨伪满文学,在解放区的历史维度中讨论东北解放区文学,两个文学时代切换的诸多细节,两类作家交替的真实处境常常被过滤掉,并很大程度上已经自然化了。但如果我们用放大镜将这个历史转换点放大,透视和勘察其中的诸多纹理和细微就会发现,东北文学在由“伪满文学”向“解放区文学”过渡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诸多文化势力混杂交错,思想意识自由混乱并缺少主导性潮流的短暂、无序和骚动的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光复后的伪满作家仍是东北文坛的重要一翼。

诺曼·史密在《反抗“满洲国”——伪满洲国女作家研究》中对光复后的东北作家作了这样的描述:“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撕裂中国领土的实体象征物——‘满洲国’,大家对过去那一段的生活经历绝口不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从伪满洲国撤走后,大部分作家留了下来,新政府承诺将会保证国家领土完整,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作家们觉得自己积极的姿态显示了爱国精神。”^①应该说光复后,留在东北的伪满作家仍对文艺抱有很大的热情和憧憬。1945年9月,以李正中为核心,他们着手创刊大型文学期刊

张丛皞,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北文学的思想源流与文化构成研究(1945—1949)”(16CZW046)阶段性成果。

①[加]诺曼·史密:《反抗“满洲国”——伪满洲国女作家研究》,李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

《东北文学》。该刊“创刊号”1945年12月1日面世,由国民图书公司发行,之后连续出刊,至1946年4月停刊,共出版5期。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人是韦长明、蓝苓、但娣、田兵、方季良、乙梅等伪满后期文坛新人。他们围绕《东北文学》还筛选了部分伪满时期的创作,着手编辑和出版“东北文学丛刊”。

光复后的东北民众在获得了精神上的缓解和松懈的同时,也陷入了历史变动和周遭变化带来的巨大眩晕之中,他们对生活充满实际和不实际的幻想和追求,有亢奋期待,有心机打算,也有迷茫幻灭。这情境正如吴谓在《所谓“伪满作家”》中所言:“我们的同胞们也有些人得意忘形的整日酗酒,玩女人,做当官的梦。于是作家们也不甘寂寞,而产生许多新作家与作品,尤其是‘批评家’也抬起头来。”^①光复后的东北人获得了自由,并为自己在新时代谋求身份和位置,但是也有人滑向了无所着落或纵情声色之中。可以说,从外部动机上来讲,《东北文学》的创刊回应了这一未就绪的时代气氛。这部分伪满作家试图以文艺创作为自我组织和精神运作的支架,洗去旧日陈迹,同时,他们也力图摆脱当时大多数人因时代走向充满变数而生的无所适从和彷徨无主的精神状态,获得区别于混沌的时代潮流性情绪的某种清晰的主体意识和时代追求。由此,围绕这个刊物上的创作和争鸣,成为处于东北历史转折点上的伪满作家思想、文化和文学的主体反应。

一、丰富的总结和有限的过往

伪满时期的东北与祖国处于分裂状态,而伪满文坛也与当时的关内文坛处于隔绝中。如何评价偏离了中国文学正轨的伪满文学及其在东北文学和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位置,成为光复后致力于在伪满文学背景上继续参与和推进东北文学的伪满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这种评价影响着伪满作家在光复后创作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地位。这一问题也因与殖民历史的复杂纠葛,与伪满作家自身的利害关系而在当时有相当难度。

《东北文学》所刊发的文章有瞻前和顾后两种倾向。瞻前倾向的文章是对伪满文坛的关照和评价;顾后倾向的文章是对光复后社会时代的反映与表现。《东北文学》的瞻前性主要集中在“结算与展望”栏目中,伪满作家对过去文坛十四年的小说、散文、诗歌、童话、译文、戏剧、女性文学七方面的创作进行了全面总结。这种当事人以杂文笔法和体裁分类回顾过往的作法自然是伪满文坛年初岁尾“文坛大结账”的惯用方式,但在《东北文学》“结算与展望”栏目中却透露出大量客观信息和真切感受。文章不仅事无巨细地罗列着十四年东北文坛的人、事和创作作品,同时还涉及作家的责任与情感、文学题材的适应性与竞争性、文学写作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选择、文学创作的历史局限等诸多内容和话题。这组既有事实资料 and 文脉梳理,又有思潮总结和评估定位的文字为日后伪满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因此不断被重视和引介,被视为伪满文学研究的历史起点。“新时期”之后的伪满文学史的叙述大体上没有脱离这个框架。可以说,这组以《东北文学》同仁为中心呈现的伪满文坛的总结,在当时难免要经过当事人主体观念的过滤和审时度势的考量,是文坛状况和创作品貌的较为客观的介绍,是对伪满时期文学创作品质、价值和地位的裁决,也是评价评估、等级厘定和荣誉分配。

在对伪满文坛的总结中,《东北文学》同仁极力避免对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作灰色化的理解,努力伸张伪满文学的抗争意识,尤其是伪满初期在哈尔滨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作家群为中心的进步创作,并以此作为对东北文坛在沦陷之初就被人诟病的某些方面的有力回应——“俏吟的出现在东北文坛是远在一九二九年的事情。彼时上海的杂志界开始彻底指摘并痛斥东北文学的症结之

^①吴谓:《所谓“伪满作家”》,《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所在,而居在哈尔滨一带的作家们开始挣扎出一条前路”。^①不难看出,这跟今天的伪满文学的理解角度非常相似。它既是客观情况,又是一种解释学范式。但是,出发点略有不同。《东北文学》同仁的解说更多是为了确认自身及其创作的合法性,强调因果联系。历史的合法性无疑是今天的合法性的前提。八十年代以来的伪满文学研究,则更多是从家国立场做必要的既符合民族情感又符合历史伦理的解释。

而当伪满统治图固,特别是文化钳制政策完全建立,进步文学没有生存空间之后,他们则强调作家的反抗意识化为内心不屈的灵魂与精神世界的暗流——“外面蒙上耻辱的皮色,肚子里却追逐着另一种境界。纵然被压缩成极小的僵蚕,而内心却蓄积了一种反作用:这恐怕是敌人认识最清楚的事”。^②

《东北文学》同仁也以自身的创作经历为佐证,挖掘殖民地时代文学创作孕育的不驯素质的各类印记。杂志刊载了一批伪满作家对自己创作经历与文学道路追忆的文章,诸如《关于〈我的日记〉的被扣押》《这都是为了我的〈七月〉》《〈灵草〉和我》《失去太阳的日子》等。它们都是讲述伪满期间文化管制和文学审查给其职业生活带来的曲折压力,或是审查过程中不被发表,或是部分章节在发表过后被约谈,或是相关人等为此惹上法律问题等等。旧事重提无疑是为镜照现在,上述“创作谈”是要将自身从伪满政治语境的共时性的同质关系中澄清出来,表明自己从未听命于“伪满洲国”意识形态的召唤而有明确的异质性和抵抗性。

在强调伪满文学抵抗因素的同时,《东北文学》同仁还在文学与审美维度中对它做最大可能的正面评价。首先是对与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文坛进行“开放性”解释,这种解释是伪满文学积极效应和历史价值的主要方面。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伪满文学除了乡土文学的顽强建构外,无法在民族化和民族传统上有更多作为。有所失,也有所得。虽然断绝了与中国文坛的全面联系,但却借助特殊契机强化了与世界文学的接触,这是伪满作家在“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中极力申明的。在总结诗歌创作时,伪满作家说,“谈到文艺,自从关里关外隔绝之后,一方面藉着外国文字吸收世界的思潮,一方面就不得不另立门户,独自走上所谓满洲的文艺的路子。为功为罪,跟谁说。不过呈现一种崭新的姿态,却是事实”。“虽然失掉祖国的温润,却得到世界思潮的滋养。可是这表现,在小说颇为显明,在诗颇隐晦”^③。光复后的伪满作家并没将伪满文坛视作完全封闭的孤岛,而认为它在非常态的历史中仍保持着某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为作家普遍醉心的现代主义文艺形式提供了充分的解释依据,而且证明了伪满文学在时间轴和空间意义上的文学自觉和存在价值。在他们看来,伪满文学在当时虽然无法全部解释为中国文学潮流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世界文学格局的构成和世界文艺潮流演化的一环却是 valuable 的。当然,他们更多是强调特殊的历史处境造就了这一客观状况,而不是作家具有某种自发的世界眼光和开放观念,这是伪满文学的价值,也是伪满时期的东北文学的价值。固然是以光复后的伪满文学历史合法性危机为前提的,但却也提示了其与后来普遍的伪满文学的阐释角度的差别。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事更多强化伪满时期乡土文学思潮与民族文化的根性联系,以及大多数作品中表现出的曲折的反抗性,很少会在“比较的方法”和“世界的视野”中来解读。

此外,伪满文学在创作主题上的个人倾向也被积极阐释。伪满作家强调伪满文学被外在的社会藩篱所羁绊,不可能对整个民族和社会有更深、更真实的体察,但是却可以回归内心,沉迷于个体生命的真切内容。伪满文学自然无法在时代化和为人生的维度中有所贡献,但是却可以在敏感的私人境界中有所作为。伪满文学无法融入抗战的洪流当中,不过可以在精神独思的内耀中有所得。“东北的作家们被日寇压迫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的时候,倘若还能有追求唯美的情绪,倒是个性的幸福了。”^④“在这样

①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东北文学》第1卷第4期。

②冷歌:《过去十四年的诗坛》,《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③冷歌:《过去十四年的诗坛》。

④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

的情势之下,爱好写作的人们只好暂投足于自我感情的讴歌里,收拾起那有血有肉有活力的文字,换上纤弱的低哑的幽咽。”^①在他们看来,厌世忧郁的主观气质和非现实主义的艺术处理方式就在个体与外界的那种持续的断裂,以及冲突、破碎和分裂的情势下产生了。它虽然疏远了集体意识和群体情怀,但也符合人性的真实,暗合了诗的本质,伪满文学也由此得到了些许丰富,这未尝不是历史的馈赠。

伪满文学固然有其创作实绩和历史意义,但是作为伪满洲国文化历史的有机部分,其局限性与消极性的匮乏维度当然无法回避,更无法抹去。《东北文学》同仁在总结伪满文学丰富的过往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的给予其停滞倒退和孱弱不足的判断。这种缺陷主要集中在缺乏独立的精神品格,不能真实反映现实的缺位上。“所谓文学,不过是命题作文。所谓言论,不过是奴役作家的笔杆,又有什么内容可言呢”。“赧如承认文学是有着反映时代与现实生活的使命的话,那么,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也就失掉了它的本性”。^②在他们看来,这些创作是“一些生长于荆棘丛里的花簇,是在这样地显示着他的营养不良”^③。作品缺乏深层洞悉力,缺乏深度分析和判断,造成了文学主题的缺陷,在语言风格上也流失了民族气质——“我们的译文当然有很多脱不掉日本气味,读起来很让人难受”^④。伪满作家最终做出了伪满时代的文学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总体判断:“倘若时代可以用齿轮来象征的话,那么,我们齿轮所回转的方向,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不是向前,而是倒行。”^⑤

很明显,伪满作家光复后对伪满文学的总结评价呈现出两极化趋势,一方面,在创作规模与基本素质上,认为这段时间的文坛虽非业绩显赫,但也并非乏善可陈,不仅作品数量甚丰,而且与世界文学有多样联系,同时又充满个人化和个性化素质。另一方面,由于伪满洲国的历史文化环境,文学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功能与能力,文学事业是倒退的,文学创作也无法获得经典品质,对此伪满作家了然于心。“开了许多花,而没有结成好多果实”^⑥是他们对伪满文学生动形象的评价。从文学经典生产和思想业绩的角度来讲,这些当事人对伪满文学的价值判断是恰如其分的。时至今日,文学史对伪满文学价值评估的基本立场仍是如此。不过,如果我们意识到光复后伪满作家对伪满文学的评价并不是见仁见智的,他们本身就是伪满文坛的一部分。他们对伪满文学的评价,也是对自身的评价,以此锁定自己在伪满文坛,以及伪满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位置。其中难免有审时度势的考量,以及强化一些历史存在,或淡化一些历史存在的心理需要和现实需要。这些作家显然既在表明自己创作的经历和创作的实力,又因这段历史的特殊而必须总结出诸多不足。“丰富又贫乏”的双重评价是借助主观的自我肯定和客观的自我否定来实现的。这是他们与黑暗历史的切割方式,也是一种解释学策略。其中透露了伪满作家的历史困境,既要与旧时代彻底诀别而反省和批判那个时代,又要强调那个时代中产生的文学对历史、现实和自己构成的意义。所以,从“伪满洲国”崩溃的那一刻起,作家们就陷入了来自“伪满”,还要挣脱“伪满”的身份僵局和枷锁中。对这个身份的超越和评估成为他们自己及研究者评价沦陷区文学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二、东北意识与创作惯性

《东北文学》在光复后不久就着手创刊,并保持了相当的文字规模和销售量,是与光复后东北文坛的活跃气氛分不开的。正如当时作家所感受到的那样,“三十四年,是东北光复的日子,东北文化界也

①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②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

③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

④孟伯:《译文十四年小记》,《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⑤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

⑥林里:《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活跃起来,刊物多了,稿酬从优的内容也多了起来”。^①“八一五”光复之后,长春的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②。作家感受到了新意,但时代还不明了,未来还不明朗。走出旧时代的伪满作家极力高扬东北文坛的主人翁意识,以个人的实践品格,以笔为旗刺破彼时的混沌与迷茫。用他们的话说,《东北文学》的创刊是“为了不耐晨光到来之际的沉重的昏睡,乃有人敲起洪状的响钟。要突破眼前的充斥文学界的混沌状态”。“它是负有东北文化复兴的一翼而诞生的”^③,“我们面前历史的诗篇正待着你们来描画,你们的笔就是读者的宇宙中心的太阳,你们不要吝啬强烈的光吧!你们要坚强地约束给自己,伏在案上操起你们的有力的笔来”。^④

致力于开创一个有别于伪满的新文学的时代是《东北文学》创刊的主要初衷。在刊物中,“东北”和“东北文学”这一地域性范畴被反复强调,它的出境率明显高于“中国”一词。一方面,这与光复后东北地方媒体和知识分子对东北历史现实问题的讨论有关,因为当时的东北无论是在历史纵向维度上,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具体历史时段中,都拥有其它地域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与话题性。另一方面,生长于斯的伪满作家也自然有东北文学情结或者是文学创作的地域本位意识在其中。当然,他们也唯恐这种本位意识可能引起关门主义或视野狭窄的指摘。所以,极力申辩地域情结与文化一体性的观念是不相悖的,是以个别和地方的建设来推动和建构整体格局。正所谓“在‘文学’之上冠以东北,但并非意味着割据的或是门阀的,反之,正欲以此一份微弱的力量,来参与创建中国文学的大业”^⑤,标榜越是地方的越是民族的。

他们强调,光复前后的东北不仅在地理意义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文化素质与文化观念上也是共同体。他们对伪满文学线索的梳理与评估,明显没有把伪满文坛与光复后的东北文坛割裂和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光复后东北文学的传统和背景来看待,认为虽然伪满文学有不足和缺陷,但是它们是前后相继和彼此相依的。正如作家所言,“开垦我们的文坛,发掘我们的人性,建设我们的东北。东北重归祖国的怀抱,我们不愿一任感情的狂呼,我们更要冷静的思索,一面复原,一面建设,以尽国民的责任于万一”。^⑥“要综合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文学遗产,加强总力,灌注热力,来充实饥荒不堪的东北文学的粮库”^⑦。这种对东北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认识和对东北文坛的规划设想,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显然都是在认定东北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申明其作为东北文学的守护者和接棒者的身份,为其在东北文化和东北文学的历史性调整中寻求主导地位。

《东北文学》产生在光复后“再造东北”的潮流中,被视为“东北文坛光复后的第一炮”“为东北文化的复兴而生”。^⑧认祖归宗的作家们试图反思和规范自我,顽强建构顺应时代潮流的新的文学主题和崭新情感,诗歌作为直抒胸臆的文体表现得格外醒目。作家们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苦难与无奈,把祖国比喻成“爹娘”,把自己比喻成“孤儿”,积贫积弱的历史中的生活就是孤儿在异乡的苦难史,无法自主,孤苦无依——“爹娘没有了消息/我永远噙着不敢流下的眼泪,乔装着欢笑。/今天,你让我开河。明天,你让我修道。/什么河啊,预备做稻田的水沟。/什么道啊,预备开兵车,拉粮食的输血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胖了,胖得有点不像初来时的模样。/我瘦了,瘦的也不像离开爹娘的模样。/逐渐,你对我开始叱骂。/你不动的发出了暴躁。随着,你骂出了难听的话。/我没办法抵抗你呀,你已经操纵了我的全家。/你已经完全操纵了我的全家”(《从你的尸身上踏过

①朱媿:《年与文学与杂感》,《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②念金华:《寄东北作家》,《东北文学》第1卷第5期。

③《东北文学发刊之词》,《东北文学》第1卷第1期。

④朱媿:《年与文学与杂感》。

⑤《东北文学发刊之词》。

⑥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

⑦渠蓉:《东北文学改革论》,《东北文学》第1卷第5期。

⑧晓戈:《有感一题》,《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去》)。他们不仅是黑暗历史中的受难者,还是光明的追求者。虽饱受政治压迫,经济压榨,文化奴役,但希望之火从未熄灭,永远不会被同化——“不要说:他已经死了/他却是正在生活/譬如毁坏了圣坛/仍吐着炎炎的火//譬如采下了玫瑰/它终要放着花朵/譬如竖琴碎了/和音却还在悲歌/我们知道/你并没有死/在我们底心里/你的思想/生出了根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东北光复了,束缚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被禁锢的思想可以畅所表达,这是民族的胜利,更是个人的自由——“我胜利了/我终复获得了自由/我站到丘岗/站到人们头顶上/狂吼 做胜利的歌唱//汪洋的渤海/是胜利的象征呵!/我直奔向希望的东方/擒来我希望的太阳”(《黄河》)。应该说,这些诗行是诗人们的心理自传,也是他们对新时代的回答。表达沦陷时期的生命创痛和精神磨难,表露黑暗历史中反抗绝望的倔强精神和顽强求索,抒发胜利后的激动人心和开拓创新的精神面貌,焕发生命的强悍和主体活力,创造新时代和新历史,是《东北文学》诗歌创作的主要追求,也是这本杂志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毫无疑问,《东北文学》大多数诗作透露出伪满作家放弃旧我,追求新我,在思想意识上弃旧求新的理性自觉,是他们埋葬和再生的精神历练。如他们所言,“所谓的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的种种譬如今日生”^①。但是,当时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的他们的成长与追求,所受的教育与文学生涯均发生在伪满相对封闭的殖民文化系统中,直到光复,很多人甚至连关内都没有去过,他们的创作和他们自己一样始终处于隔绝的环境里,在短时间内彻底隔断与旧历史的联系,改弦易辙地完成完全符合新时代诉求的自足自泰的文学创作绝非易事。旧的时代主题多没在《东北文学》中延续,但风格气韵却无法抹去。对于诗歌和散文这类以表白直露为主要内容,且相对容易调动和获得新含义和新语调的文体,可以尽可能的以技术处理与情感取舍来获得新鲜的心灵支点和抒情位置。但是,作为趋于经验模式的小说,则更多受制于作者熟悉的情节处理方式与情绪氛围,不容易扭转业已形成的写作经验和创作惰性。《东北文学》上的小说主题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个体的沉沦和爱情的失落,以《某医生的手记》《雨天的旅客》《诱惑》《泡沫》等为代表;第二,枪痛的生活遭际,以《血族》《寒流》《小银子和她的家族》《小溪流》等为代表;第三,伪满有信仰的进步青年的悲惨遭遇,以《早上七点的时候》为代表。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将自我成长、爱情经验和下层苦难作为表现内容,展现的都是个体记忆与情感的特殊观念,坚守着某种他们认为适中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姿态和人道主义立场,以内心独白型的略显虚无和个人化的叙述,渲染那种破败渺小和卑微压抑的氛围,传递生活陷落和人性冲突所引发的忧郁厌世和悲切苦闷,缺少宏大的历史场面、昂扬的民族心理、刚健的思想之气,以及乐观明朗的调子。当然,这种残缺的人性体验和日常生活未尝不是历史灰烬中民族苦难的折射,可却与当时其它地域文学的抗争品格和雄壮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使是直接表现民族救亡的《早上七点的时候》,也是以爱情体验而非抗日实践为中心。这与其它区域文学中的那种“血和泪”的正邪对抗,以及金刚怒目式的对历史暴力的彰显的叙事明显不同。虽然《东北文学》中的一些作品是光复前创作的,根据创作者的介绍,很多是为了凑够版面加到里边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在作者看来是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经过选择和处理才刊发的。显然,已经摆脱殖民统治的作家再也无需以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姿态示人,但在创作上他们并没有新思路,仍陈陈相因地徘徊在伪满文学的旧路之上。

《东北文学》的创作与当时社会基调和期待不符,对现实的表现也天地狭窄,情感寡淡,即便如此,《东北文学》同仁仍坚持着文学小天地的某种美学原则。大宇在《我的建设》中这样说:“我当想到社会上太高尚的道德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些太铺张的见解也是失败的目标,凡细小的事,如能弄得好,和英雄所做的伟业同是一样的难得:我就在卑怯自苦的来磨炼我的智慧,所要求的是那为人所不齿的

^①姚远:《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

事情,我就要扶植它,一步步的能做起来,当然不是求于人的炫耀,或是诱引谁,它是不要求些什么的”“一天天的不停的工作着,不求虚缈的夸张,也不为它铺张什么见解,只是用一粒粒泥沙,一滴滴的水,那心血,那眼泪”。^①这是对他们文学信念和创作宗旨的声明。他们关心公共生活,有着救世的愿望,但却不习惯搬运宏大话语,不善于直接把文字付诸于道德演练与政治说教,他们回避崇高、矫饰和虚伪,强调文学的非政治和非实用性观念,坚守清浅、诚挚和鲜活,关注细微和细小,以自省乃至自我牺牲的精神获得某种点滴的滋养和陶冶。与其说是自觉的审美追求,还不如说是只能如此的选择。他们想要使这类与自身熟悉的创作格调高度自洽的美学原则拥有合理性。但无论怎样,这都昭示了与中国主流文坛疏离多年并无更多联系的伪满作家,在思维方式和审美心态上与新的历史趋势和新的时代文学的相对性和暧昧性,也说明了伪满作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瓦解旧的文学体制提供的写作方式,真正调整自己并重建起一套适应新的历史想象、政治认同和文化禁忌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和符合新的意识形态感知方式的艺术经验。

三、身份危机与历史困境

应该说,从光复的那一刻开始,归家寻梦的伪满作家是要努力成为中国作家中无差别的一员,当然,这是要经历自我改造和自我重构的。如《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所说,光复后的伪满作家要“解除作者自身的生活的矛盾”“要再充分发挥其坚韧的健全意识”^②。即便如此,他们因身份和属性而经历着新时代的挑战和冲击,这种职业生活前景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自我精神重负和难以名状的紧张和焦虑,而预伏的危机在光复后一个月就被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在八月里面还会感受到光复的喜悦。但自九月以后,直至现在,这中间千变万化,情况日益险恶,其实也愈远于想象。于是,喜悦尽去,所来的都全是悲哀了”^③。

伪满文人的这种悲哀的感觉想必是来自与日俱增的奚落与排斥。如前所述,《东北文学》的诗作大多回应了时代的旋律,有着光明和乐观的格调,但也有个别创作褪去了健朗和生气,显得隐晦困惑,有着莫可名状的压抑和焦灼。作家们敏感到自己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不正宗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可能带来的困厄处境和个人伤害,由此生出怜悯与疼痛感——“我们是灰色的羊群/灰色的羊群/有着灰色的命运……//我们盲目地四下里奔驰/我们将何所往呢/我们,我们……/我们乃伫立在时代的通衢/我们恪守自己的命运而战悚”(《灰色的羊群》)。刚刚走出黑暗时代的他们,希望能够被新时代的阳光沐浴,希望被新的社会认可、接受,希望能够得到呵护和保护。“我是一粒种子/久埋无人的荒郊/我是一棵幼芽/慢慢的伸出地表”(《种子》)。“我们只期望自己的祖国/会理我们的寒冷饥饿/我们只切盼自己的同胞/会给我们一滴水一团热”(《胜利之歌》)。两首诗不仅有着伪满文学一贯的感伤和晦暗,而且价值散落的意象揭示了伪满作家深刻的内在矛盾。无处皈依的幽冥感和身处他乡的异域感表征着失去家园身份和被抛弃所带来的放逐与伤害。而以羊这种柔弱温顺的动物自喻,除了象征在废墟的世界中被抽空的羸弱和极度孤立的卑微外,哀伤和惊骇中也透露着规训和服从,仿佛表白着忠诚和没有背叛,渴望被宽恕和救赎。这两首诗歌可以看作是诗人精神的漂流物,里面有着某种实践流失感,语义也存在裂缝和两歧,有面对异族统治失去精神家园的委屈游荡的流浪体验,也有光复后面对主流秩序对自己高度怀疑的那种无法遮掩的遗留的旧时代的噩梦和闪烁自剖。“灰色”“羊群”“满目”“命运的战栗”等有负罪感的心理意象,仿佛诉说着动荡世界中和歧途迷路上的心酸往事,以及丧失身份

① 大字:《我的建设》,《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② 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③ 华民:《光复与文人》,《东北文学》第1卷第1期。

的窒息感受,是历史的残留记忆,也是光复后脆弱的心音。曾经的阵痛和现实的隐痛混淆于一处,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又有很强的自我指涉性。既是对压迫不平的宣泄,又是如履薄冰的心悸。

即使如此,伪满作家自知仍无法完全摆脱与殖民文化的复杂纠结。在当时东北社会肃清伪满毒瘤的历史潮流中,新时代对于他们而言是隔阂和陌生的,在心理经验与文化情趣上无法真正融入其中,精神上经历着震荡,预伏着危险,甚至让他们自己也失去了强悍和自信,感到自不如人——“我看见一个有力气的人,藏在血色的外衣里边,眼睛里照射出强烈的光芒。我让他来救我,他说我不能救你,我只能给你力量。我觉得他洞悉了我懦弱的心。”^①作家们强调他们仍“在淘练的过程中”^②,要真正实现自我改造和自我革新,就要超越和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性——“现在好如由梦中醒来一般/他抖擞掉了浑身的懒/虽然步伐是有些迟慢/却迈开大脚一直地向前”(《祖国》)。他们对挣脱历史惰性,获得特殊的品质和勇气的脱胎换骨的迫切渴望,如韦长明诗歌《从你的死尸上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与旧时代的“尸体”诀别,“决定从现在起,恢复我丰腴的灵魂”,要写出“灵和热”的文学来。唯有如此,才能“解除作者自身的生活的矛盾”,才能“充分发挥其坚韧的健全意识”^③。

《东北文学》同仁在光复后力图摆脱强大的精神重负,延续东北文坛主力军的地位,但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遭当头棒喝。这以对“创刊号”上但娣的小说《血族》的批评为代表。小说较具体验实感和心灵深度,描写了一个在松花江畔的男子因家境贫寒,希望通过养鸡补贴家用,但因不懂技术和没有经验,无钱购买优良饲料,天灾等原因,养鸡失败,理想破灭。主人公在持续受到打击的过程中,心情低落,不断迁怒寄居家里的妹妹,最后在情感上伤害了家人。《血族》在创作初衷和情节内容是趋向生活原型的,可以视作日据时期中国人困苦生活和人伦关系的一个剪影。按照作者的说法,这篇小说创作于伪满时期,但是因为文化管制等原因未能发表。作者将之公开发表在光复之后,显然认为其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与社会气氛,能够被读者认可,但是,作品发表后立即遭到了批评。1945年12月9日《光明日报》“星火”栏目,发表了署名要望的文章《我读了〈东北文学〉》,他认为,从这些作品中,还没有看到“眼前的一切”,认定《血族》是“伪满遗毒”。他的批判主要在“文本内容”和“作家身份”层面上展开。在文本内容上,作者在主人公和日本侨民高桥的对话中使用了“协和语”。这段文字被认为是一种与殖民主义思维方式互为表里的数典忘祖的表现,且表现主人公和日本人高桥之间的民族冲突和正邪对抗的程度远远不够。人物虽然有心理品质,但却缺少社会属性,缺乏深刻的观察和充分的形象化,因此肤浅、幼稚。正所谓“这篇文章没有动人的魄力,读来像一口白开水”^④。很明显,在要望看来,这个小说缺少阔远、厚重和宏大的格局,还停留在消极、静止和落后的时代感中。而在作家身份上,要望把在伪满时期生活和写作的作家一律斥为有奴化思想的“伪满作家”,认为他们是有着历史污点和原罪的,他们难以摆脱旧时代的梦魇,而且也不该从旧历史中获得解放。

面对指责和诟病,《东北文学》同仁很快就撰文反击,像但娣的《关于奴化思想及伪满作家——质之于要望先生》、吴谓的《所谓伪满作家》、晓戈的《有感一题》、金华的《不是篇》都是典型代表。有关“协和语”,但娣认为,《血族》表现的是伪满时期的生活,作为生活的日常化部分,以协和语沟通无可厚非。面对民族冲突和抗争深广度不够的指责,辩护者认为,作品明显批判了殖民地时代民众生活场景中的不平等的种族关系,有感时忧国的意识在其中,作为普通人生活的还原和伪满时期的创作,这个尺度边界已经非常大了。面对“伪满女作家”的指责,但娣指出,“伪满”应该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性质概念,是不是伪满作家要根据作品的倾向而定,而不能随意地扣帽子。吴谓也认为,是否是“伪满作

①大字:《我的建设》。

②吴谓:《所谓“伪满作家”》。

③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④要望:《我读了〈东北文学〉》,《光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家”应该以是否高呼过“康德文学”和“大和魂”，赴日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为主要标志，而把在伪满时代创作过的作家都归为伪满作家，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个标准可以说一直被其沿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和历史解放的新时期，他们仍以此作为自己与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汉奸文人相区别的主要依据，并被大多数该领域的研究者所秉持。

应该说，要望批评的第一方面更符合文学批评的本分，同时也最有力量，而后者则然是非文学知识和立场的，在当时，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他们都更关注后者。不能把生活和在伪满时期发表作品的人归为“伪满作家”，在今天看来是不辩自明的轻巧事情，可在那时却显得非同小可。这不仅仅是文化情趣不同带来的隔膜，而且是光复后的东北文坛试图对伪满作家及其创作贴上现成的负面道德标签，将之打入另册的显现，也与当时东北社会肃清汉奸毒瘤的社会运动的主体部分相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伪满作家在反驳当时东北文坛批判的声音时，表露出对“理论”和“批评家”的消极评价，强调“文学价值”，贬斥“理论价值”。显然，沦陷14年的殖民背景下，有明确社会价值轴心和精神史观的文学文化理论难有容身之处。文学创作都是不自由的，更何况系统化的、带有明确价值目标和精神立场的理论建设。“十四年间的东北文艺，创作固有相当产量，唯理论实很缺乏，这也是因为避开政治而不能率直言之，自然无用责难”^①。而在光复后，伪满作家与文坛的批评家不再是价值的共同体，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表义的实践活动，在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的前提下被高度地实用化和工具化了。伪满作家与光复后的批评家处于某种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关系中，既无法迎合彼此的期待视野，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共鸣和共振。他们不仅人生见地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使用的社会学知识和话语模式也大相径庭。因此，面对责难，充满精神危机和不适感的伪满作家也生出了对理论的批评。金华在《不是篇》中以反讽的口吻说，“我们的批评家看到了眼前的一切，而我们的作家就没有看到眼前的一切。”^②“我们深恶着架空的文学理论”^③。毫无疑问，由于伪满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在非自由状态下进行的，他们自然谙熟一些知识，但是这些破碎不成体统的观念，不是属于伪满殖民时代的话语，就是来自纷染杂碎的外国文学，而这些话语在光复后的东北文化语境中或不再自足，或成为观念禁忌。他们必须要面对非常陌生的意识形态观念和不熟悉的理论乃至各种非文学知识的成见，在新的文化想象和政治认同的挑战下，在无法精准获得意义和熟练应用理论的困境前，特别是很多批评家所谓的理论批评实则是以社会学知识为背景的政治批判时，生出了抗拒心理。

结语

《东北文学》在1940年代东北文学的转型和转折中具有典型和原型意义。不甘沉溺的伪满作家在“伪满洲国”崩溃后，仍然试图在“后伪满文学”时代为伪满文学和自身谋求合法性，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和解读这类作家光复后的心态、处境和选择。无论是对过往的回顾与反思，对过去的解释和切割，还是内心的表白与创作，都是为其在光复后寻找和确定新的支点，他们不仅需要文化的支点，也需要文学和信仰的支点。不管是对光复前的创作，还是光复后的创作，他们都强调其特定的历史位置和时代价值，并由此介入中国文学的意义建构当中。但在《东北文学》的创作、评论和争鸣中，我们不难看出拥有特定文学资源、精神症候、历史处境的这支特殊文人群体与当时文坛的紧张关系，之中有阻力和矛盾，也有不安和隔膜。很多问题是当时依旧试图以作家身份安身立命的伪满作家无法真正认知和解决的。1946年，长春获得了短暂解放，《东北文学》因主编韦长明参加革命离开长春而停刊。这在当

① 冷歌：《过去十四年的诗坛》。

② 念金华：《寄东北作家》。

③ 金华：《不是篇》，《东北文学》第1卷第2期。

时固然没有立刻成为伪满作家命运的标志性拐点,但这个东北历史褶皱上的刊物的命运无疑成为了即将从中心沦落到边缘,与大时代渐行渐远,最终坠入历史底层深处而销声匿迹的伪满作家命运的缩影和注脚。往事依稀魂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四十年后,历经沧桑坎坷的创刊者韦长明对《东北文学》这样评价:“现在看起来,与其说它开创着东北当代文学的先河,还不如说它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继续。的确如此,《东北文学》大部分所反映的不是胜利后的喜悦、行动和彷徨,而仍然是胜利前的苦难和挣扎。”^①显然,当与历史拉开距离后,当事人在经历了历史风云际会之后,领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演变中的是非因果,终于获得了对当时处于剧烈演变和分化的历史现场更精准的感受力。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它之后的历史中,很少有研究者把《东北文学》视为中国东北当代文学的先河。韦长明对《东北文学》评价如此之高,无外乎强调这本杂志与当代中国的血脉联系,无外乎强调这本杂志的作者与当代文学群体间的血缘关系。《东北文学》中也确实有着苦难和挣扎,只不过这种苦难和挣扎未必是沉醉于旧世界和没有融入胜利的大喜悦与大希望,而是刚刚经历史震动的心怀忧惧的作家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的迷茫与惧恐。东北光复是东北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间关口,最复杂的历史交替点,最显著的文化变革的临界点,伴随着最复杂的伦理观念的动荡分化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撕扯。《东北文学》是一本记录着一代作家心灵事件的文学杂志,它记录下了伪满作家在这个时间点上由解放到受挫,再到阵痛的历史瞬间。最终,记忆变成了历史,生命变成了命运。

(责任编辑:程天君 石亚兵)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at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around 1946: Focusing on the Creation of and Controversy over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ZHANG Conghao

Abstract: After the recovery of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n August 1945, a group of writers from the former Puppet Manchuria set up the large-scale literary journal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in Changchun and showed great enthusiasm and desire to bid farewell to the old times, create new literature, build the Northeastern literary world, and conduct self-salvation after the liber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y summed up the “rich past” or the “limited past”, carried forward the “northeastern 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e inertia”, and showed a “self-purification tendency” and a feeling of “personal crisis”. The works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and the controversies they aroused truly embody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nsformations in the absence of dominant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Facing the confused future and driven by their tenacious persistence, the writers from the former Puppet Manchuria tried to maintain their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northeastern literary world. However, their complicated and unpleasant interaction with the reality suggests that they felt identity crisis and the pain of cultural separation and that the old cultural and literary era was coming to an end.

Keywords: northeastern literature; writers of the Puppet Manchuri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ZHANG Conghao,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①韦长明:《〈东北文学〉发刊前后》,宋原放编《中国出版史料 现代部分 补卷 1919年5月—1937年7月》(中),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717页。